

南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丛书

变动世界的

政治理论

BIANDONG SHIJIE DE ZHENGZHI LILUN

程同顺等◎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南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丛书

变动世界的政治理论

程同顺等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动世界的政治理论 / 程同顺等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8.10

(南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丛书)

ISBN 978-7-5618-6284-1

I. ①变… II. ①程… III. ①政治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8552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239mm
印 张	17
字 数	353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
定 价	45.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宁与和谐，相反，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疯狂和混乱了。尤其是经过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也开始变得不淡定了，各种极端和偏激的政治力量纷纷粉墨登场，甚至在有些国家还获得了执政的机会，西方国家长期引以为傲的民主也开始遭遇危机和困境。这个世界更加复杂多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政治理论是现实世界政治现象的抽象化表达，多变的世界一定产生多变的理论。

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政治学理论一直居于学科的基础和指导地位，因此无论什么时期，都不能忽视对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我长期关注农村政治和农村发展，但同时对政治学理论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

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是我自1997年以来发表过的与政治学理论相关的主要论文。这些论文可以分为几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政治学的学科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现代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以及中国比较政治学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战略；第二部分是对协合民主的研究及民主困境的探讨，主要包括协合民主的概念和特征，协合民主的适用范围，协合民主在欧盟治理中的体现，印度的混合式民主，当代西方民主存在的问题及出路等；第三部分主要是民粹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讨论民粹主义的概念，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的形式，当前世界民粹主义泛滥的原因及本质等；第四部分集中讨论女权主义和权利保护

问题，涉及美国女权主义和禁酒运动的关系，女性主义对传统自治观念的批判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等；第五部分主要是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方式和经济体系批判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论文有的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则是与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我与学生的合作研究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我提出观点和思路，由学生搜集资料完成初稿，我再修改润色；另一种则是学生独立形成观点和思路，向我征求意见后写作初稿，我提出修改意见后再不断修改，直至完成。不论是哪种合作模式的成果，我都要感谢这些学生，他们活力四射，充满灵感，富有激情和创新精神，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窠臼，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促进。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论文都是公开发表过的，不同期刊的格式和体例标准都不相同，因此在收入论文集的过程中，为了统一格式和体例的需要，对不同的论文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当然，由于论文发表的时间前后不一，为了阅读的方便，我对有些论文的语言文字也作了微调。由于学识和能力所限，可能存在不少谬误和漏洞，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笔者

2018年3月

目 录

比较政治学：走向没落还是再度辉煌·····	1
21 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 ·····	11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主流期刊的研究 (2001—2012)·····	20
理性推进比较政治学发展·····	38
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纠结的理性与不确定性·····	44
什么是协合民主？——兼与多数民主比较·····	54
异质社会中的民主·····	65
协合民主下的欧盟治理·····	74
分裂社会的个人、族群与国家·····	84
印度的混合式民主·····	95
民主的回归：从选举民主到过程民主·····	109
网络媒体时代政治合法性的悖论·····	125
民主的结果为什么有时会令人失望？——对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的述评·····	137
民粹动员：一种研究民粹主义的新方法·····	147
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	160
欧盟向心力缘何减弱？·····	169
国际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新动向·····	175
美国女权运动与禁酒运动的共振效应·····	182
依赖视域下的自治与平等——对法曼《自治的神话：依赖理论》的述评 ···	191
从主题对应到理论构建——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路径研究·····	205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下女性基本权利的保障 ·····	219
西方文化霸权失败原因探析·····	231
绿色资本主义思潮评析·····	241
食物主权：全新的政治学概念·····	254

比较政治学：走向没落还是再度辉煌

程同顺

内容提要：西方比较政治学在经历了 20 世纪中期的比较政治学革命后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范围大大扩展，对个案国家的研究更加深入，全新的技术方法大量使用，也产生了大量的有影响的理论。但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比较政治学陷入了一种四分五裂的局面，缺乏确定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的指导理论，也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不过，比较政治学的危机不是它走向没落的信号，而正是它再度鼎盛的前兆。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科史；政治发展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比较政治学在西方学界达到了鼎盛时期，它占据了整个政治学的中心，在政治学中处于统率地位，甚至有人不无霸道地声称，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那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的比较政治学几乎垄断了整个政治学。而今天，比较政治学却呈现出了一派凄凉的衰败景象：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研究中心和范围，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甚至连一套大家彼此都能接受的概念都没有。比较政治学如此地四分五裂、破碎不堪，甚至有人怀疑它是否还算得上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悲观和不满的气氛笼罩着比较政治学界。

但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沉浸在这种悲观的气氛之中。一些学者认为，同 20 世纪 50—60 年代相比，比较政治学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发展得太快了。由于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快的发展，因此发展本身也带来了许多麻烦。比较政治学目前的状况正如它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一样，也是充满困惑和怀疑，但当时正是这种困惑和怀疑的刺激才带来了比较政治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辉煌。所以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危机不是它走向没落的信号，而正是它再度鼎盛的前兆。

一、比较政治学的历史与现状

要全面地了解比较政治学，正确理解和评价今天比较政治学的地位和处境，需要我们对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旧比较政治学

如果把比较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都看作比较政治学的话，那比较政治学的历史就太悠久了。亚里士多德以其对古希腊城邦的研究而被公认是比较政治研究最早的先行者。其后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布丹，当然还有孟德斯鸠，都可被看作比较政治学家。马克思也大量地从他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中引证比较性的资料。托克维尔和布赖斯关于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著作，之所以被看作最好的经典著作，是因为他们的著作中有大量的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资料。所以在现代政治学诞生以前，比较政治研究就非常兴盛了。

然而，当19世纪末现代政治学在美国诞生的时候，比较政治学仅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深植着一种美国优越于欧洲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意识。这种种族中心意识认为，美国不需要从其他地方学习任何东西；相反，确信美国宪法优越的观念使他们认为，世界其他地方必须向美国学习。因此，当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开始发展的时候，就主要以研究美国政治为主。研究其他各国政治的比较政治学在各研究机构中长期处于“外来户”的位置，不被美国的政治学界所接受。那些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人常被看作在政治学的其他领域无所作为的人。

早期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欧洲国家，主要有英国、法国和德国，后来还有前苏联。主要的教师和学生大多来自欧洲，这就必然使他们在以研究美国政治为主的美国政治学界更加孤立。而且，欧洲的政治学在那时还没有完全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是由一些受过法律学训练的人来担当的。所以那时的比较政治学时常有一种形式主义和法律主义的倾向。他们主要关注政治的、制度的、法律规定的方面，如宪法的条文和原则、司法规则和程序、政府的制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比较政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战争打破了美国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迫使美国首次长久地直面世界舞台，使美国认识到了研究和了解外国的重要性。其次，战争和纳粹所推行的种族排外政策

产生了一次欧洲向美国移民的浪潮,给美国带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欧洲社会和政治有较高专业化的认识,所以很快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尤其在比较政治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使比较政治学在战后出现了一个发展的高潮。

战争和纳粹暴行造成了难以磨灭的痛苦和恐怖,这深深地影响了战后第一代比较政治学者。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纽曼(Franz Neumann)、阿伦特(Hannah Arendt)、芬那(Herman Finer)的教学和著述,都充分浸透着浓厚的伦理和道德色彩。他们比较性地研究极权主义,分析纳粹制度,解剖纳粹主义的根源,目的在于防止类似于纳粹主义、极权主义的势力重登权力宝座。因此在战后初期,比较政治学不是仅仅不动声色地分析不同的政治制度,它还带着一种饱含激情的道德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政治学在战后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它自身也正酝酿着一场自我革命。革命发端于1952年现代比较政治学的先驱们在美国西北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过去的比较政治研究遭到了全面的抨击。批评者们指责它太形式化和法律化,说它过分关注于宪法和政府机构的政治行为而忽略了利益集团、政党的政治行为。1953年据此写成了一份题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总结报告,但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55年,当麦克里迪斯(Roy C. Macridis)在他的同行面前巧舌如簧地发表他的激动人心的观点的时候,这个研讨会的观点才开始盛行起来。

麦克里迪斯指责过去的比较政治学过分局限于孤立地关注西欧国家,并且仅仅是描述,而缺少分析,是形式主义的和法律主义的而非动态的研究,个案研究占主导地位而缺乏真正的比较。麦克里迪斯的批判言辞犀利、文采飞扬,他用两极对立的语言鲜明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下子引起了政治学界的轰动,对比较政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这种认为比较政治学应该非狭隘化、非形式主义和法律主义,应当注重动态和真正比较的观点,开始比较政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旧比较政治学的时代宣告结束,新比较政治学诞生了。

(二) 新比较政治学的产生与鼎盛

另外一个像麦克里迪斯一样激烈地批判旧比较政治学的重要人物是阿尔蒙德。但他后来的名声似乎比麦克里迪斯更为显赫,他不仅批判了旧比较政治学,而且还开启了新比较政治学。

阿尔蒙德身体力行于他对旧比较政治学的批判。他不仅开始关注政治文化、政治过程和利益集团等，还开始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很快以政治发展理论领袖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阿尔蒙德在他的研究中，运用帕森斯的模型变量，把发展中国家描述为狭隘性的、讲求门第出身的、机构和职能混合的社会，而把发达国家描述为普遍性的、讲求业绩能力的、机构和职能分化的社会。他用这种标准来确定不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和发展的不同程度。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阿尔蒙德和科曼在1960年主编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该书运用普遍性的比较框架力图建立一种关于发展的社会科学的一般公式，通过这个公式，所有国家的政治都将可以拿来分析。这大大地激励了美国的学者们。他们由此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会给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带来发展和民主。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科学合法性和要为发展中国家作贡献的道德目标的确定性，使得发展研究颇具吸引力。

所以于此前后，其他许多人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有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李普塞特的《政治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派伊的《马来亚的游击共产主义》和《政治发展面面观》，多伊奇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等。这些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著作几乎主导了新比较政治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主要集中于研究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就是不同途径的政治发展研究。

总之，在这一时期，比较政治学有一个明确的研究中心，即政治发展，形成了一些能达成共识的理论和方法，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雄霸美国政治学界，几乎淹没了政治学的其他领域。以政治发展研究为主的新比较政治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产生以后，6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政治发展理论带有严重的发展主义倾向和冷战的意识形态色彩。发展学者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来规定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方面在于完成他们帮助发展中国的“道义”目标，另一方面也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的普及，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歪曲为极权和不民主的。

政治发展研究的这些弱点使它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很快就陷入了困境。那些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返回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失望地发现，用发展理论确定的西方式的标准，是无法有效地衡量他们所研究的这些国家的。许多学者经过反思之后，也开始怀疑西方模式的普遍性及其对发展中国的适用性了。

在这种形势下，比较政治学的另一个人物粉墨登场了。1968年，亨廷顿出版了他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提出了对发展标准的有力批评，并且推出了一个取而代之的方案。亨廷顿争辩说，社会动员和现代化并非能促进民主的发展，而是相反，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起着一种损害民主和政治发展的作用。尽管亨廷顿因为强调秩序和稳定以及政党和军队的重要性而被批评为是保守主义的，但他的修正逐渐在比较政治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们对在比较政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研究的批评日渐扩大。发展主义的研究被批评为是有偏见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其研究方法被指责为忽视了阶级和阶级冲突以及国际市场、经济力量和依附关系的作用。尤其是以结构功能主义建构政治学的企图遭到的批评更为激烈，更有讽刺意味。人们批评它是模糊的和不精确的，并且缺乏理论的成熟性。

虽然这些潮水般的批评并不全然公正，但是比较政治学统一在政治发展研究旗帜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系列新的理论方法相继出现。比较政治学不再有一致的研究中心和一套相对统一的理论了，它陷入了一种分崩离析的局面。

（三）新比较政治学的分裂

最初取代发展主义的两种研究途径是各阶级合作主义和“重新复活”的马克思主义。后者还在发展主义鼎盛的时候就对它提出了怀疑和批评，只是由于当时势单力薄，所以这些批评并未能引起人们注意，现在则由于发展主义的失败而获得了新生，并且由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稍后，比较政治体系的数学模型再度复兴，在政治分析中对经济因素普遍忽视的情形让位于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在比较政治学情有独钟于发展中国家20年后，又出现了一个欧洲研究勃兴的局面。同时，其他因素，像伊朗革命的发生，印度种姓制度和非洲部落的长期存在，拉丁美洲新的民族主义对中央集权经济的坚持，使得一些人开始重新评价第三世界许多土生土长的制度和社会模式的价值和生命力。另外，还有一些“理论岛”专门研究诸如投票行为、政治参与、官僚行为、国家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政策分析等特定的问题。

总之，现在比较政治学处于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没有一个集中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统一的居主导地位的理论。

二、比较政治学的成就

简单回顾了一下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史，拿它的现在与过去作一比较，有助于我们总结比较政治学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比较政治学的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范围大大扩展

如前所述，比较政治学现在不再仅仅是研究几个西欧国家了，而是已经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纳入了它的研究范围。在历史上，比较政治学曾主要涉及4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前苏联，而现在它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南欧和东欧国家等。在更多的比较政治学的教科书上，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同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了。比较政治学要想更具有普遍性和科学性，就需要更广泛的个案研究，所以扩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对于学者们学术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随着比较政治学范围的扩大，它也变得更少具有片面性和种族中心主义色彩。政治学不再以西方的模式如美国的宪法、英国的议会制度、德国的官僚体制和法国的共和主义为标准来评价发展中国家了。前苏联也不再是20世纪革命的唯一范例了，中国、古巴等国的革命也受到了同样的关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高潮中，西方模式是被运用的唯一标准。而现在，学者们不仅更倾向于运用一些非西方模式或半西方模式来分析发展中国家，而且运用它们来分析西方国家的做法也日渐盛行起来。

（二）对个案国家的研究更深入

新比较政治学对个案国家的研究更深入了。这个成就的直接后果就是它促进了一系列新学科的产生。起初，人们对社会输入转化为政治决定的重视产生了政治社会学。后来，比较政治学者把它们注意力转移到了关注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制约作用，于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再生。同时，学者们不仅限于对政府正式机构的研究，而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对政府的非正式机构，利益集团和政党等非政府机构，以及大众和精英的态度等方面的研究。老式的简单概念化的国家特性的研究让位给了更复杂、更细致的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比较政治学者也开始研究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另外，对诸如部族、派系、种姓、部落和家族等非正式团体的研究，还促进了另一门分支

学科——政治人类学的诞生。

这些成就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一个不幸的代价就是由于对非正式行为者的重视而忽略了对国家本身及其制度的研究。国家一度被看成一个“黑箱”，影响、压力和态度输入其中，然后它输出政府决策。因此而导致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国家本身被看成了一个神秘的中枢，人们觉得它难以琢磨。这种趋势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国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重新得到了重视，成为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因素。

（三）新的技术性研究方法大量增加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新比较政治学引进了一系列新方法，如实地调查、资料分析、系统分析等。比较政治学的这些新方法与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相吻合，它们彼此互相促进。

目前，比较政治学已经不仅更成熟，而且更有适应性了。诸如民意测验、统计分析以及时间序列等定量方法被大量运用。同时，比较政治学也意识到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優勢了。另外，人们也认识到，普遍性的功能研究和独特性的个案研究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二者之间的论战也大大减少了。

（四）理论大大丰富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程中，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更加丰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是传统主义的，基本上没有涉及正在发展的比较理论和方法，新比较政治学则展示了大量的新理论。

新比较政治学的早期著作与功能主义关系密切。功能主义的方法诞生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尤其自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帕森斯的著作的流行而盛行起来。它促使比较学者重新审视用研究西欧的方法无法对其进行研究的新独立国家。因此，在阿尔蒙德和科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体现出浓厚的功能主义的理论色彩就不足为奇了。严格地说，功能主义其实不是什么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而只是一些松散的框架，连阿尔蒙德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种开放性、不严格性和尝试性既是功能主义的优势，又是它的一个不足。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是比较政治学理论激增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不时会看到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面。大量的新理论，包括一种从宏观经济学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版本同时产生了。韦阿达（Howard J. Wiarda）和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提出了最新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模式。另外，一些“理论岛”专门研究一些特定的问题，如投票行

为、政治参与、官僚行为以及公共政策分析等。

三、比较政治学目前的困难和希望

比较政治学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它目前却正面临危机，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确定的研究对象

比较政治学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其缺乏确定的研究对象。目前比较政治学所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有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有对政治过程的研究，还有对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研究。另外，大量的比较政治学者则是研究一些更为专门化的问题，如投票行为、政治参与、官僚行为、国家的作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这些研究不仅彼此互不关联，而且甚至根本不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人们很难总结出它们的共性，为比较政治学划定出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因此也就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在作为一个学科继续存在的理由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都是以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为前提的；一门学科如果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就无法形成确定的内容体系，也就难以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这是比较政治学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

（二）缺乏基本的指导理论

对一门学科来说，恐怕理论的多样性不是什么坏事。但对比较政治学来说，问题不在于其理论的多样性，而在于对基本的指导性的理论缺乏共识。由于缺乏确定的研究对象、足够的知识综合和必要的科学严密性，到目前为止，比较政治学还没有像经济学那样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来指导研究者的工作。当学者们研究同一个问题或者解释某一个现象时，由于他们所采用的研究途径和方法的差异，所产生的结论也会截然不同，无法进行对话和交流；而当他们研究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前进时，那就更不会为不同理论的沟通和比较提供任何帮助了。这反过来又会为其知识和理论的进一步综合增添许多障碍。最终使比较政治学界呈现出一派人人各自为战、四分五裂的状况，所以也就很难共同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了。这就使人们对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进一步产生了怀疑。

（三）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尽管近年来比较政治学有许多新的开创性的研究，但是却没有出现具有较强烈的知识综合性的力作，这使比较政治学显得没有多大的作为。这是当今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严重不足。因为大多数的地区研究和个案研究由于缺乏在科学和比较意义上的知识综合和抽象，所以难以产生协调一致的普遍性的研究成果；然而涉及大量国家的普遍性的研究著作似乎对各个国家又缺乏深刻和充分的分析，甚至有些分析还是歪曲性的，所以也难以形成高质量的综合性的成果。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主编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现在已经出到了第四版，这本著作试图将个案研究和普遍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但由于这部著作是由11位作者分工完成的，所以这种先总论、后分论式的结合就显得极为牵强。一个学科在一段时期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力作，就会使人们对这个学科丧失信心并将其逐渐淡忘，所以现在比较政治学迫切需要产生一些具有较强综合性的巨著来重振它的声威。

不过，应当注意到，尽管比较政治学目前存在这么多的困难，面临着生存危机，但是它还是保持了知识体系的独立性。虽然人们很难对比较政治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对于一项研究是不是属于比较政治学，人们还是一望而知的。这给了比较政治学者一定的安慰，使他们还能看到一线希望的曙光。虽然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仍将不断地听到需要一个新的包融一切的理论的高谈阔论，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保持一定的风格和理论的异质性恐怕并不完全是坏事，相反，这或许正是一个学科更为健康和充满生机的表现。并且，目前的比较政治学或许正如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样，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革命。所以乐观地说，比较政治学还是充满希望的，它在今天的危机很可能正是它再度繁荣前的一个蛰伏期。

参考文献：

[1] HOWARD J W.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85.

[2] MACRIDIS R C, BROWN B E. Comparative Politics: Notes and Readings, 6th ed.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6.

[3] NEEDLER M C. The Concept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91.

[4] 艾伦·艾萨克. 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年，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 1987.

[5] 阿尔蒙德, 小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 体系、过程和政策. 曹沛霖,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6] 格林斯坦, 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上). 竺乾威,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7] 格林斯坦, 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 储复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8] 阿尔蒙德, 西德尼·维巴. 公民文化. 马殿君, 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9] 阿尔蒙德, 小鲍威尔·宾汉姆. 当代比较政治学: 世界展望. 朱曾汶,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0]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1] 塞缪尔·P. 亨廷顿, 琼·纳尔逊. 难以抉择. 汪晓寿,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12]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 高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2期)

21 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

程同顺 王越乙 编译^①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美国政治学界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研究方法进行的一场大讨论。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过分追求科学化、数量化研究方法的状况，有些政治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政治学研究方法应该多元化，给予定性研究者适当的空间，政治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应该以方法为导向。但那些坚持数量方法的学者则明确反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对定性个案研究。

关键词：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兴起以来，美国政治学越来越追求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从经济学中产生的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数量统计等方法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在政治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即使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也没有改变政治学这种追求科学化、数量化的倾向。直到 2000 年，一封电子邮件的批评向美国政治学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状况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在 21 世纪之初的一场新革命。

一、美国政治学“新革命”的发端

2000 年 10 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有位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人士以“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宣言，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政治学会及其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说他们排斥定性研究，偏向“可

^① 资料来源：Sharla A. Stewart：Revolution from Within，*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June 2003。作者是《芝大校刊》（*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她所撰写的数篇关于美国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发展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人们广为引用。